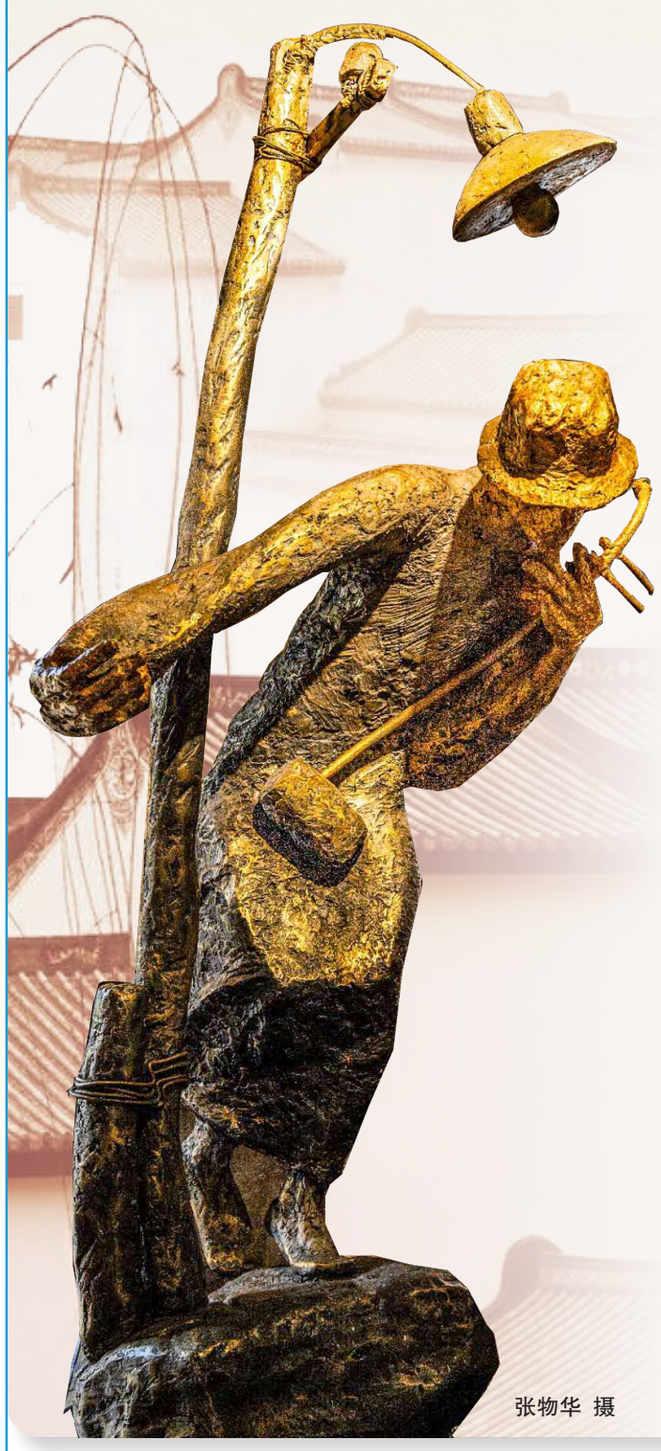
形塑阿炳 把二泉雅韵凝作城间风景



江南腔调工作室 读城

今年是无锡获评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一周年。阿炳和他的二胡曲《二泉映月》是无锡音乐底蕴中最具世界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之一。无锡籍雕塑家、江南大学教授徐诚一专注阿炳主题雕塑创作近40载，累计创作相关作品300余件。这些“阿炳”曾在阿炳故居、太湖广场、无锡地铁惠山古镇站、无锡市民中心、江苏省美术馆、中国美术馆等地展出，以雕塑艺术将阿炳和《二泉映月》传播开来，让城市文化名片深入人心。

近日，由江南文化研究院主办的“无锡‘世界音乐之都’与徐诚一阿炳雕塑艺术”专题研讨会在伯渎创意港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徐诚一数十年来深耕阿炳主题雕塑创作的艺术实践，从跨媒介对话、城市文化价值、文化传播新形态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为无锡“世界音乐之都”建设与江南文化名城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张物华 摄

以塑赋形，“让声音在城市里站起来”

1950年夏，音乐学家杨荫浏、琵琶名家曹安和在无锡用一台钢丝录音机为民间音乐家阿炳录制了二胡曲《二泉映月》。自此，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名扬四海，成为这座城市的闪亮标签。在无锡，阿炳文化已不只是历史记忆，从他的故居、祖居到崇安寺二泉映月广场、惠山映月里，从民族歌剧《二泉》，到阿炳文化艺术季，再到徐诚一的阿炳主题雕塑……这座城市从上到下，都在以不同形式挖掘、提炼、传播阿炳文化标识。而今，如何用好阿炳这一文化符号来赋能“世界音乐之都”建设，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一个人、一座城、一首曲子，被反复塑造成一组庞大的视觉文本，这在当代雕塑创作中十分鲜见。”无锡太湖学院副教授宋佳音注意到徐诚一与阿炳之间跨越时空的精神契合——两人都在“行走”中创作：徐诚一长期用脚步丈量无锡的土地，在行走中聆听市井的声音；而阿炳在街巷里一边走一边拉琴，他的灵感与旋律，是在身体的移动与环境的刺激中捕捉到的。徐诚一把这些“行走的阿炳”一一赋形：或翘首企盼，或依偎慰藉，或支离破碎，或孤独倔强，或黯然神伤，或傲然劲挺……“这些作品的底色不是悲情、悲悯，而是即使在饥寒交迫、双目失明的绝境里，依然不肯把琴放下的坚守，映射出的是无锡这座城市的不屈与希望。”在宋佳音眼中，徐诚一在进行一场关于“如何让一段声音在城市里站起来”的持续实验，让人们不仅在转角能够听见音乐，也能看到音乐。

无锡获评“世界音乐之都”是对这座城市千年乐脉的肯定。从鸿山遗址出土的青瓷乐器，到天韵社、江南丝竹、道教音乐绵延不绝的民间传承，这片深厚的音乐土壤孕育出了阿炳这样不朽的民间艺术家。资深媒体人庄拥提出，民乐是无锡的王牌，但民乐在对外传播中难免会遇到信息缺失的问题，因此，无锡在“世界音乐之都”的品牌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对民乐进行多元载体的转译，推动民乐的媒介化与场景创造。资深导演张伟鸣学音乐出身，他认为，当前，社会对阿炳的认知仍存在一些偏差，他呼吁官方加强对阿炳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让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民间音乐家，从而更好地理解他的音乐世界。

艺术架桥，“感动观众前先感动自己”

围绕阿炳及其《二泉映月》，诞生了不少艺术创作，有广播剧、电影、歌曲、舞剧、歌剧等。“当时，我采访的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83岁了。”多年前，作家黑陶写过一部口述史作品《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身为一名生活在无锡的作家，他抢救性地记录了关于阿炳的口述记忆，留存下大量关于阿炳生前言行、市井演奏状态、生活境遇的一手鲜活史料，留住快要消散的民间记忆碎片。而徐诚一则用雕塑艺术语言将阿炳的故事“讲述”出来。比起他人口中的陈述，黑陶直言，徐诚一的阿炳主题雕塑体现出强烈的探索性与现代性，这种弱化具象的表现方式，反而呈现出一种更深层的精神真实。

徐诚一塑造阿炳形象几十年的事，是无锡文艺圈里的一段佳话。人们从他的艺术坚守中，读出了一位艺术家的品格。艺术家陈刚评价，徐诚一的阿炳雕塑视觉冲击力强，作品以夸张的造型和线条，让观众由表及里地感受到阿炳的痛苦、挣扎与扭曲。此外，该系列还运用了高浮雕、写实圆雕，以及叙事性很强的高浮雕组合等表现手法。这些作品大量吸收民间艺术元素，借鉴陕西陶俑、惠山泥人、山西彩塑、德化瓷的制作技艺，极大地丰富了表现形式。而这些雕塑的最大特点，是作品与精神的相互交融。“一件作品要感动观众，首先要感动自己，我们能从这些作品中，读出作者内心的真诚，感受到作者创作情感的丰富与细腻。”陈刚说。

这些年，徐诚一一边创作一边展出，让阿炳主题雕塑走出美术馆，融入市民的日常空间。“当阿炳从音乐形象化为雕塑，又走进城市公共空间与文旅消费场景时，无锡‘世界音乐之都’的文化表达，也因此更加可触、可感、可亲近。”媒体人杨东红建议，依托阿炳主题雕塑开发文创IP，打造“世界音乐之都”系列伴手礼，推出沉浸式城市音乐漫游路线，构建“雕塑+音乐+乡土”研学体系。

雅俗共生，“让经典可触可感可参与”

在肯定徐诚一艺术成就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与展望。作家陈建琪提出“苦难同构”的概念。“当‘苦难’成为恒定的思想底色时，创作者的思想容易陷入单一维度的感伤。”陈建琪指出，《二泉映月》的终极指向不是“诉苦”，而是“超脱”——小泽征尔说“要跪下来听”，跪的不是苦难，而是苦难之上那片寥廓的星空。他建议徐诚一多塑造“笑的阿炳”“醉的阿炳”“顽童般的阿炳”，同时突破阿炳主题艺术创作中“人拉琴”的传统叙事模式，将阿炳的形象与文化符号隐秘地融入山墙、水波与城市天际线，在公共表达与艺术实验之间寻求平衡。

无锡市委党校教师余若澜对“雅—俗”二元对立提出了反思性见解。她认为阿炳正是打破“雅—俗”二元对立的一个例证：他极“俗”，是市井的代表，晚年讽议时势、拟物抒情；又极“雅”，深植无锡道教音乐传统，从“道”的层面听《二泉映月》，不仅能听到人生苦难，还有拜月祈福与对人世沧桑的哲思。余若澜还关注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对文艺创作的赋能，并指出无锡在数字文化产业方面的优势，她引用钱伟长回忆中钱氏家族的音乐生活，强调“真正的创新，来自更多人的参与，更多载体的参与，在于更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她认为，“世界音乐之都”的建设正在重塑城市的文旅形态、产业结构和城市气质，探索新路径、构建新范式。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雕塑是凝固的乐章，两者共同讲述着无锡的音乐故事。此次研讨会将音乐传承与造型艺术创新相结合。在徐诚一“形塑阿炳”的过程中，民乐传承路径也不断拓展。与会专家表示，期待数字技术赋能后，阿炳不再只是历史中的民间艺人，阿炳文化也不再局限于某次研讨或演出，而是以可触、可感、可参与的方式，成为无锡城市文化持续生长的文化印记。

（张月、韩玲）

艺评

戏韵繁花 相逢陶都

步入宜兴市美术馆展厅，“戏出繁花——中国美术馆藏戏曲主题民间美术作品展”静静地铺展在眼前。素雅的展墙之上，一件件质朴鲜活的民间艺术作品错落陈列，瞬间将我带入戏曲与乡土美术交融的诗意天地。这场远道而来的艺术巡展，将国家级馆藏的珍贵作品带到陶都宜兴，让我们足不出城，便能近距离邂逅根植于华夏乡土的戏曲之美、民间之韵。

本次展览汇集木版年画、戏曲剪纸、传统皮影、民俗彩绘等多样民间艺术形式。不同于舞台上转瞬即逝的戏曲表演，这些匠人巧手创作的作品，将戏台之上的生旦净末丑、悲欢故事、古今传奇一一定格。展厅文字介绍，戏曲源于乡野烟火，民间美术复刻戏曲百态，两者相辅相成、共生共荣，深深扎根于百姓生活。回望往昔，乡村戏台临水而建、依土而搭，每当锣鼓声起，十里八乡的百姓便奔赴戏台、驻足观赏。戏曲落幕之后，民间匠人将深入人心的戏文故事镌刻于木版、裁剪于红纸、雕琢于皮料，化作一件件民俗艺术品，装点寻常人家的屋舍厅堂。悠悠岁月里，戏文中的忠孝节义、善恶是非，便以这样温柔的方式浸润人心，代代相传。

驻足细看一件件展品，最动人的，莫过于饱含烟火气息的艺术张力。展厅中的戏曲人物彩绘色彩浓烈艳丽，配色大胆鲜活，人物衣袂翩跹、纹饰精巧繁复。武将英姿飒爽、风骨凛然，眉眼间尽显忠义刚气；文生、青衣温婉灵动、神态生动自然。这些作品没有过度雕琢的匠气，也无学院艺术的拘谨刻板，满是民间艺人纯粹真挚的创作热忱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一旁的皮影作品更是妙趣横生，简练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人物身姿形貌，寥寥数笔便形神兼备。我仿佛看见旧时乡村夜晚，一盏灯火、一方素布，皮影在幕后翻飞舞动，演绎千秋家国、人间离合，方寸之间，便是万千天地。这些平凡的民间匠人，或许未曾饱读诗书，却以口耳相传的戏文为蓝本，以双手为笔、以匠心为墨，留住了传统戏曲最鲜活的模样。

戏曲不只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更是古人教化人心、传递正道的乡土课堂。在教育尚不普及的年代，寻常百姓难以读书识字，戏台便成了最生动的学堂。一出出戏曲，歌颂忠义报国的仁人志士，唾弃虚伪狡诈的奸佞小人，诉说人间冷暖、世间公道。而民间美术将动态的舞台表演化为静态的艺术图景，让戏曲故事跳出戏台，融入百姓朝夕所见的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引导世人明善恶、知荣辱、懂忠义。一纸一画，皆是人间百态；一形一色，尽藏烟火初心。

宜兴文脉绵长，紫砂温润、书画传韵。此番戏曲民间美术展览落地陶都，让扎根乡土的戏曲美学与温润雅致的江南文脉相融共生，碰撞出别样的东方诗意。细细品读展品，我深切感受到民间艺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它源于泥土、归于人民，承载着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与美好期许。热烈的色彩、鲜活的造型、质朴的表达，留存着最纯粹的东方审美与人文情怀。

戏韵流转，繁花自来。这场“戏出繁花”展览，让沉静的戏曲文化以全新姿态绽放光彩。走出展厅，戏曲人物的灵动身影仍历历在目，婉转戏韵、铿锵鼓点仿佛萦绕耳畔。只要有人欣赏、有人铭记、有人传承，古韵繁花便会岁岁常开、生生不息。

（梅南频）

钟书 二泉月

无锡日报报业集团 滨湖区委宣传部 滨湖区委统战部 滨湖高新区（雪浪街道） 联合出品

琵琶行：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段浔阳江

长江到了九江，又被叫作浔阳江。1200年前，具有深厚平民情怀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正以一个落魄官宦、失意文人的身份，面对浔阳江的流水愁肠百结。这一天，因为一场千古流传的诗人与歌女的邂逅，一篇名传千古的长诗横空出世。这首诗不带任何造作，没有半点虚情，全诗六百余字，文思畅达，一气呵成，前有细腻的小序，后有磅礴的正文。它就是著名的七言歌行体叙事诗《琵琶行》。

◆贬谪的失意

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能从《琵琶行》里摘出几句，引为自己人生的注脚与前行的叮咛。可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为什么名震长安的白居易，会来到这千里之外的九江？为什么他会为一个素昧平生的歌女，泪湿衣衫？百转千回的浔阳江，是否注定成为他人生事业的转折点、价值追求的新高峰？

大唐元和十年（815年），长安发生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遇刺身亡。当时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率先上书，请求严查凶手。这一举动随后被政敌指为“越职言事”，也成为他被贬江州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的江州大致对应今天的江西九江。抵达江州时，白居易44岁，正是壮志满怀、豪情未减的年纪。然而，寂寥的江州让他感觉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回望20年前，彼时的白居易意气风发、才华横溢。他16岁写下传诵一时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引得长安广为传抄。此后一段时期，他多作讽喻诗，屡屡直指时政得失、人事弊病，描摹社会的幽暗疾苦。譬如《卖炭翁》，痛斥宦官掠夺卖炭老翁的薪炭；《观刈麦》，对照写出农人疾苦与官吏盘剥。他曾天真地以为世间自有公道，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武元衡遇刺这桩惊天大案，最终将他卷入风波。这是他第一次被逐出长安，离开京城的政治圈层。

贬谪带来的痛苦与失落，唯有亲历者方能深切体会。他在写给挚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写道：“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到了江州之后，他虽名义上是江州司马，实则是被闲置、受人监看的闲人。在那里，他无实权、少交游、无繁务。“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正是他居所环境的真实写照。周遭荒僻萧瑟，每到入夜，陪伴他的只有低沉的江声，满目寥落。

◆偶遇的共鸣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等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夜晚。元和十一年（816年）秋天，白居易到浔阳江头送别友人，酒过数巡，忽有琵琶乐声自江面飘来，“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他与友人都为之动容，忘了离别之事。随后发现小船之上，有女子弹奏琵琶。邀她前来相见，女子“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数曲弹罢，女子放下琵琶，诉说身世。

没想到的是，这位琵琶女竟也来自长安，“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放在当年，称得上红极一时的乐伎。奈何韶华易逝，容颜不再。后来她嫁作商人妇，辗转流落江州。“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常年外出经商，独留她孤守空船。追忆年少时长安的繁华盛景、旧日荣光，孤寂难遣之时，便拨弄熟悉的琵琶曲。

同样的长安来处，同样的失意沦落。白居易心底积压一年多的委屈与失意，一下子被弦声、被她的身世触动。想起昔日在长安的意气风发，眼前这位琵琶女，何尝不是另一个失意的自己？白居易恍然觉得，这个秋江之夜、这叶小舟、这位女子，是命运送来的相逢。是夜，他才思泉涌，铺纸研墨，欣然落笔，一篇旷世长诗就此成型。

◆诗行的回响

诗的开篇：“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诗的收尾：“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命运的际遇，让两人同病相怜、潸然落泪，而哭得最痛的，便是江州司马白居易。写下“野火烧不尽”的天才诗人、远贬千里的落魄官员，与萍水相逢的琵琶女，默然相对。泪水之中，有对命运的叩问，有对现实的无奈，有对前路的迷茫，更藏着一份深重的孤独。原来世间，尚有能读懂自己的人。

《琵琶行》写成之后，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文中虽无一字直抒怨愤，却让读者感知到时代的寒凉，也因此招致朝堂权贵更多的忌惮。在遇见琵琶女、写下《琵琶行》之前，白居易满心愤懑；而写完《琵琶行》之后，他的内心平静了，释然了。诸多不解，终化作与自我的和解。

往后岁月，白居易的诗风渐渐转向闲适、恬淡、悠远。没有人可以长久保持抗争的姿态、激愤的心境。他的诗篇跨越千年，光华不减。读《琵琶行》，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照见自身。仿佛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曾有过浔阳江边这样一个秋夜，听过属于自己的一曲“琵琶声”，在命运的落差里暗自怅惘。白居易把这份人人心中所有、却难以言说的心情，写进字里行间，千年之后的我们读来，依然能听见江心弦响，共情那滴落在青衫上的泪。这，正是《琵琶行》跨越漫长时光，依旧动人的力量。

（於建东）